

从“和同开珎”钱谈渤海国与日本的经济往来

田玉娥¹ 刘舜强²

(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河南 洛阳 471000; 2. 故宫博物院 中国 北京 100009)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ing on the coin carved Hetongkaibao (和同开珎), we could find the economic exchanges of Bohai state and Japan were very close, the production exported covered hunting, agriculture, handicraft and so on, a great deal people of Bohai state and Japan carried on commerce with each other to their opposite county for the purpose of business. Bohai State had opened three important traffic lines from the Northeast of China to Japan during trade contacts with Japan.

key words: Hetongkaibao (和同开珎) coin, Bohai state; Japan; economy

摘要: 通过对钱币——“和同开珎”的研究, 发现渤海国与日本的经济往来非常密切, 不仅出口狩猎、农业、手工业产品等, 还有大量以商贸为目的的渤海人、日本人互到对方的国土, 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渤海国在与日本进行交聘和商业往来的过程中开辟了三条由中国东北至日本的重要交通线——日本道。

关键词: 和同开珎; 钱币; 渤海国; 日本; 经济

一、和同开珎

“和同开珎”是公元 708 年(日本奈良朝和铜元年)铸造、发行的钱币, 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流通货币。它是日本“皇朝十二钱”(和铜元年至天德二年所铸造的 12 种铜币)的第 1 种。“和同开珎”有银、铜两种, 银钱于公元 708 年 5 月铸行, 当年 8 月改铸铜钱, 次年停铸银钱, 只留铜钱一种; 在形制上模仿公元 621 年发行的唐朝“开元通宝”, 铜钱的直径为 24 毫米左右, 孔方的边长为约 7 毫米, 字体也同样采用隶书。“和同开珎”的名称, 钱文上“同”是“铜”的省文, “珎”是“寶(宝)”的省文, 因此“和同开珎”其实就是“和铜开寶”^{[1][2]}。(见图)

“和同开珎”在中国出土甚少, 除 1970 年陕西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中出土 5 枚银质“和同开珎”钱外, 几乎再未见到过此钱出土的报道^[3]。

然而在此之前, 1933 年~1934 年, 日本人在渤海遗址发现和出土了一些铜钱, 其中曾于宫城内第一殿西室北边地面上, 发现一枚日本铜钱



和同开珎钱拓片

“和同开珎”^[4]。这枚铜钱的发现, 对于今天认识唐王朝下的渤海国与日本的经济往来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渤海国

渤海国是唐至五代初, 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其疆域主要包括今天我国东北地区的东南部, 朝鲜半岛东北部和俄罗斯南滨海地区东南部。组成渤海国的主体是靺鞨部族, 靺鞨是古代居住于我国东北地区的肃慎族后裔, 是现在满族的先祖。靺鞨在战国以前即被称为肃慎, 战国以后肃慎改称挹娄, 至北魏时期称为勿吉。在隋唐史书中, 勿吉的后人被称为“靺

靺鞨”。按《隋书·靺鞨传》的记载,当时的靺鞨有七部,其一粟末部,居住在今天松花江上游一带,拥有胜兵数千;其二泊咄部,居粟末部北,在今天吉林省扶余县一带;其三安东骨部,居泊咄部东北,今天松花江中下游;其四拂涅部,居泊咄部东,在今天兴凯湖附近;其五号室部,居拂涅部东,在今天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地区;其六黑水部,居安东骨部西北,在今天黑龙江下游两岸;其七白山部,居粟末部东南,在今天吉林省延边东部,七部中以黑水部最为强大^[5]。

隋初,靺鞨诸部相继遣使于隋。隋高祖杨坚盛宴款待。靺鞨使者表示,“臣等僻处一方,道途悠远,闻国内有圣人,故来朝拜。既蒙劳赐,亲奉圣颜,下情不胜欢喜,愿得以长为奴仆也”^[6]。

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靺鞨所居之处,除与中原相连接,西与契丹相连,南接高句丽,所以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受到中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契丹及高句丽的影响。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营州地区的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被唐封为震国公。公元698年,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吸收当地其他各部,在当时东北地区东部靺鞨故地(今吉林省敦化一带),建立“震国”,自立为王。当时的震国同时受到南部统一不久的新罗国、西部强大的后东突厥及其属部契丹与室韦的胁迫,所处形式十分险恶。

为了谋求生机,改变自己所处的艰难处境,公元713年,大祚荣接受唐册封为渤海郡王,并改国号为“渤海”。自此,震国结束了与唐朝的交恶,实现了同中央唐王朝的和解,并确立了与其的贡属地位,成为唐朝所辖区域内的一个地方性民族政权。其结果是使得粟末靺鞨成功地摆脱了后东突厥的威胁,也使得新罗人不得不“筑长城于北境”^[7],防止其南下进攻。当时,渤海国吸引了隔海相望的日本国派使者前来观其风俗,寻求进行交流的可能性。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四年(公元720年)“遣渡岛津清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8],这是日本文献中对“靺鞨国”的最早记载。虽然文中的“渡岛津清津”的地理位置尚不明确,但其大致范围应当在日本海沿岸的偏北一带。虽然有学者认为,日本文献中的“靺鞨”指的是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9]。但在当

时的东北亚,除新罗外,渤海国是一支力量很强的地方政权,同时,唐朝常常因其部族名而称其为“靺鞨”,所以日本文献中的“靺鞨国”指渤海国的可能性更大。

三、渤海国与日本的经济往来

尽管渤海国是唐朝属辖之下的一个“羁縻州府”,但是其拥有自己的职官、司法、军队以及外交,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在第二代王大武艺时期,渤海国对唐表现出强烈的割据意识和不满,因而开始着力于同中央王朝之外的地区进行交流。公元727年(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渤海大武艺王仁安九年),渤海大武艺王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击将军果毅、智尉德周、别将舍那娄等24人赴日本^[10]。这是渤海国正式向日本派遣的第一个使团。自此开始,渤海国与日本建立了正式的交流往来。但作为唐朝的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国在对日本的交往中,并没有以独立的国家自居,大武艺仍然使用了唐朝册封给他的“渤海郡王”爵位和授予的“左金吾卫大将军”官称,把自己及渤海国政权继续置于大唐的政治管理体制之下。

渤海国与日本的经济往来主要是以交聘的方式进行的。自公元727年,大武艺派出第一个遣日使团起到渤海末代王大諲譔(大諲譔十三年,后梁贞名五年,公元919年)派出最后一个使团为止,“聘于日本者,凡三十四次”^[11]。渤海国的遣日使以渤海王的名义,向以天皇为代表的日本政府致礼,这样的做法,除了当时牵制新罗的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外,还希望通过向日本进献方物与日本开展贸易往来,从而获得日本的各种物产。这样的做法显示出渤海国与日本交往的积极性和成效性。有学者统计,见于史料的渤海国至日本礼物主要有^[12]:

728年,貂皮300张;

739年,大虫皮7张,豹皮6张,黑皮7张,人参30斤,蜂蜜3斛;

824年,契丹大羯2口,□子2口,《长庆宣明历经》不详,梵本《尊圣咒》不详;

872年,大虫皮7张,豹皮6张,熊皮7张,麝香不详,人参不详,蜂蜜5斛,暗摸靴不详;

877年又赠数目不明的珍玩和玳瑁杯。

从文献来看,在渤海国赠送给日本的物品中,与狩猎相关的动物产品居多,这说明在当

时,自然经济尤其是狩猎经济在渤海国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同时这些与狩猎相关的产品也是作为渤海国的主要物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换、贸易的。按《渤海国志长编》记载,渤海国除了狩猎经济外,农业、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可以种植高品质的粟、稻等粮食作物,有着先进的冶铁、炼铜技术,金属铸造、陶瓷制作技术也比较先进。渤海国可以自行烧制水平较高的瓷器,在与中原的交往中,也曾将所铸佛像进献给唐朝。

在渤海国送给日本的进物中,有来自周边地区的物品,如“契丹大羯”、唐朝的“《长庆宣明历经》”、“梵本《尊圣咒》”等,这说明渤海国在当时长期保持着和周边地区的文化、经济往来;渤海国成为当时沟通唐、契丹与日本等的重要桥梁。

与渤海国相比,日本在与渤海国交往的过程中显得并不十分积极,还经常以大国身份自居。日本在通好渤海国的过程中,共派遣“遣渤海使”14次^[13],所赠渤海国的礼物主要有:绢、棉、丝、绡、绫、彩帛、调帛、调布、庸布、襦罗、白罗等丝绸染织品,另外还有一些黄金、水银、金漆、漆、海石榴油、水晶念珠、槟榔扇等土特产品^[14]。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当时的赠物以纺织品居多,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

渤海国积极与日本进行交聘活动,赠送物产,其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与日本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向日本输出自己的特产,同时输入日本的各种货物。仅公元746年就有“渤海及铁利总一千一百余人慕化来朝,安置出羽国,给衣食而还”^[15]。对于这里的纪录,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与渤、日之间的经济往来有关。在公元771年,渤海国的使团共325人到达出羽,被安置在常陆^[16]。在这些人中,除了少数人负有外交使命外,绝大多数人应当是出于商业贸易目的到达日本的。又公元872年,日本清和天皇贞观十四年“内阁寮与渤海客回易货物,庚寅,听京师人与渤海客交易。辛卯,听诸市人与客徒私相市易。是日官钱四十万赐渤海国使等,乃唤集市人卖与客徒此间土物”^[17]。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渤海国在与日本通好的过程中,两国已经发生了较为密切的经济往来。以商贸为目的的渤海人大量进入日本,与日

本方面进行商业往来,而双方的贸易数额也相当巨大,在一次的交易中货币使用量可以达到数十万钱。如前所述,在渤海国的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县八连城)曾经发现过日本在8世纪初自行铸造的首例货币“和同开珎”钱^[18],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两国之间经济关系之密切,在相互贸易中不断深入和发展,渤海国可能使用了日本的铸币。

更重要的是,渤海国在与日本进行交聘和商业往来的过程中,开辟了三条由中国东北至日本的重要交通线——“日本道”。

在唐代,“大抵渤海使臣赴日之途经,自首都南出,取道今之哈尔巴岭(今延吉县境内),东转而至龙原府。又珲春附近之朴西得湾(俄罗斯之波谢特湾),似当日初航之港。考其使航之所向,尝止于日本之能登、加贺等郡,是由更北而止于出羽、佐渡诸港焉”^[19]。

由渤海国至日本的航线分别是^[20]:

(1) 北线。也称北路,是指从波谢特湾出发,向东横渡日本海到达加、越、能(加贺、越前、能登)三郡,即包括今石川、福井在内的北陆地区,这是渤海国第4个访日使团访日时,首先开辟的航路。这条航线的航程约为900公里,是连通渤海国东京龙原府与日本京城(平安京、平城京)之间最近的航线,自渤海国第13次赴日使团后,多沿此线航行。

(2) 筑紫线。从波谢特湾出发,沿朝鲜半岛东海南下,到达日本的筑紫(北九州)。据《渤海国志长编》记载,渤海国第五次使团曾沿筑紫线到达日本,并从筑紫出发到达了日本的难波江口(今大阪市)。

(3) 南海府线。从渤海国南海府(今朝鲜北部咸镜北道镜城)出发,沿朝鲜半岛东岸行驶,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筑紫。公元776年,渤海国第9任赴日大使史都蒙走的就是这条线。

三条线中,筑紫线和南海府线均不便利,如果渤海使臣走上述两线到达日本首都,都要绕行日本的西海岸,费时费力,同时又受海流和季风影响,颇多险阻。因此,在渤海的34次访日过程中,上述两线各走一次即告废止。

四、结语

渤海国与日本之间密切的经济往来,成为8~9世纪东北亚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渤海出使日本,最多(下转91页)

封地，他们对怀孟路均产生重要影响。

- [1]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焦作市博物馆．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道出陶俑 [J]．中原文物，2008 (1)．
- [2] 胡渭．禹贡锥指（卷2）[M]．冀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 [D]．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11-12．
- [4] 高伟．元代太医院及医官制度 [J]．兰州大学学报，1994 (1)：39．
- [5] 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19）[M]．诸院部·尚药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 宋濂．元史 [M]．中华书局校勘本，1976．
- [7] 许有壬．至正集（卷44）·大都三皇庙碑．四部丛刊本．
- [8] 司马迁．史记（卷120）[M]．汲郑列传．中华

书局校勘本，1975．

- [9] 滕安上．东庵集（卷4）七言律诗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刘禹锡．赠送致仕滕庶子先辈 [M] // 御定全唐诗（卷359）．中华书局，1979．
- [11] 孟子（卷4）．公孙丑·章句下．四部丛刊本．
- [12] 通制条格（卷6）[M]．选举·选格．黄时鉴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84．
- [13] 余扶危．洛阳元王述墓清理 [J]．考古，1976 (6)．
- [14] 李磐．颜天翼神道碑 [M] // (光绪) 邢台县志．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北卷，第36册．
- [15]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9）元故尚医窦君墓碣铭 [M]．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310．
- [16] 孟繁清．蒙元时期的颜氏三碑 [J]．中国史研究，2009 (3)．

（责任编辑：黄林纳）

（上接79页）的一次达325人，分乘17只船。最少的也有20余人，一般都在百人以上。渤海商船把东北特产貂皮、熊皮、虎皮、人参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当地的舞蹈、音乐带到日本。又将日本的彩帛、綾、黄金、金漆等物运回渤海。沟通了日本和我国东北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渤海人将唐朝的经文、历法带到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而日本道的开通，更促进了日本与东北亚之间了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 [1] 滝沢武雄．日本の貨幣の歴史 [M]．吉川弘文館，1996．
- [2] 松村明編．大辞林（第三版）[M]．三省堂，2006．
- [3]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 [J]．文物，1972 (1)．
- [4] 原田淑人等．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发掘调查 [J]．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5册，东京，1939．转引自刁丽伟，王林晏．关于渤海国货币的三个问题 [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3)：40-42．
- [5] [6] (唐) 魏征监修．隋书·靺鞨传 [M]．卷八一．见于《二十五史》(5)，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7] (高丽)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 [M]．卷八．新罗纪，圣德王二十年，秋七月条．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 [8] (日本) 藤原继绳、菅野真道，秋篠安人．续日本纪 [M]．元正天皇养老四年，正月丙子条．岩波書店，1989．
- [9] 马一虹．古代日本对靺鞨的认识 [J]．北方文物，2004 (3)．
- [10]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 [M]．卷十八，文征国书．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 [11]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 [M]．卷十六，族俗考．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 [12] 滕红岩．渤海致日本礼物探析 [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2)．
- [13] 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 [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 [14]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 [M]．卷十七．食货考．日本所赠者条．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 [15] (日本) 藤原继绳、菅野真道，秋篠安人．续日本纪 [M]．卷十七．天平十八年条．岩波書店，1989．
- [16] 児玉幸多．日本の歴史 [M]．別巻5年表，地図，中央公論社，1965．
- [17]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 [M]．卷十七．总略下．日本三代实录．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 [18] 青木和夫．日本の歴史（奈良の都）[M]．中央公論社，1966．
- [19]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 [M]．卷四十．地理志．交通五道．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 [20]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 [M]．卷四十三．文物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锴生）